

南音馆阁的世纪变迁

——以厦门集安堂南音社为例

陈孝余¹, 王琼²

(1.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2.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乐种之一, 南音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传统艺术的代表, 而馆阁作为南音文化传承典型场域, 其历史变迁就是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之一。通过对厦门集安堂南音社的个案调查来考察泉州南音馆阁近代以来百年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认识新中国前、新中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3个阶段来其百年变迁的历程内涵和变迁特征, 进而对南音传承做整体性思考。

[关键词] 南音; 馆阁; 集安堂

[中图分类号] J 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5-0050-07

一、问题提出：南音馆阁研究的历史视角

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南音是福建闽南地区音乐文化的杰出代表, 称谓诸多, 如“管弦”“南乐”“南曲”“南管”等, 因发祥地为泉州又被称为泉州南音。南音是汉唐古乐遗韵, 被国内音乐学界誉为“中国音乐史的活化石”, 拥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并先后入选国家级和世界级双料“非遗”而有着卓越的文化身份。因此, 泉州南音的传承与保护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重大课题。馆阁(乐社、曲馆)是传统南音基本且典型的文化场所(笔者视其为“元域”)。目前, 南音馆阁研究主要从弦友、唱奏、曲目、乐器以及规制等方面展开, 以记录为特点。近10年来, 相关成果表现为“非遗”保护语境下的以硕士、博士论文为主的现状调研, 大多从传承、保护角度出发, 采取实地调查的手段, 探讨传承策略。遗憾的是, 目前对于南音馆阁传承方式的研究薄弱, 而从历史视角深入研究者尤为缺乏。仅从馆阁层面看, 历史视角的研究需要加强, 而这种加强的方式之一就是微观

层面的个案质性研究。从国内来看, 南音传承研究成果丰硕, 但馆阁研究相对不足, 其个案调查尤为缺乏。就集安堂而言, 马越已经从人类学角度对集安堂进行深入调查并解读了“共同利益社团”等观念, 但该研究侧重乐社组织以及社员即人的视角, 缺乏对馆阁本身的历史考察^[1]。

总之, 作为千年古乐, 泉州南音历史研究有待加强, 其中馆阁作为传统南音典型场域的历史变迁需要关注。笔者运用田野调查方式对现存的百年老馆阁进行考察。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 通过对厦门集安堂南音社等至今“健在”的著名南音老馆阁往事的回顾来厘清南音馆阁百年历史变迁。此外, 为了能更清晰地表述问题, 本研究采用口述资料和文献史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个案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基于此, 笔者从田野调查的十多个南音馆社中挑选出较为典型的百年馆阁——厦门的集安堂, 作为个案进行历史研究。

二、历史考察：传统馆阁“集安堂”的百年变迁

本研究根据对集安堂现任社长曾小咪女士的

[收稿日期] 2021-09-29

[基金项目] 202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陈孝余(1977—), 男, 安徽蚌埠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音乐教育、民族音乐学研究。

采访笔录,结合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整体梳理“集安堂”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力图勾勒出百年老馆阁的世纪变迁脉络,旨在呈现南音馆阁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规律^①。

(一) 1949年10月以前

集安堂南乐社是清末建立的老馆阁,创立于光绪八年(1883)^②,乐社成员对此非常自豪,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该社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发展南音艺术事业不遗余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由此可见,该社是有近140年的“百年老店”,这种世纪经历让集安堂这位“老人”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这种内涵和底蕴表现为一种历史感,让笔者刚一走近“她”就深深感受到,而采访之后,“她”的故事让这种历史感更加深切。该社在百年历史中做出了很多非常值得后人记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

溯源地看,集安堂南乐社成立于清末但也是几经沧桑。据调查,该社从成立之初即1883年直到1936年这53年的半个世纪多时间里社址都设在“望高石”,之后迁至桂州堆(现在山仔顶),1910年移到田仔增(现在的南田巷),不久又在河仔墘建置集安堂别墅(该社现在的地址)。1930年是个节点,由中国银行襄理陈昆来经手集资,承蒙工商界及海外侨胞赞助,遂将南田35号、37号、39号旧平屋改建为三层大楼(墙上立“集安堂”三字),河仔墘17号、19号、31号、54号亦扩建为三层楼房。两处社址弦友云集,名声大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集安堂”当初是居无定所的,这看来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只有遇到“贵人”相助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馆”。

集安堂成立初期南音传承状况非常好,其负责人是陈美弦,成员多为商界、知识界人士,文化及音乐素质较高。这一时期集安堂名家辈出,如箫、弦“神手”林徽祥(吐目祥),品、箫、弦“三绝”黄韞山,琵琶“贤人”陈秀津(万

舍伯),琵琶、三弦名手白坎臣、陈颐堂(昆来),左手琵琶、左手二弦傅嗣东等,不胜枚举。清末民初时期集安堂为南音传承做出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从资料来看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1)整理曲谱;(2)录制唱片;(3)跨境传承。如,清末时林祥玉先生应邀前往台北传授南曲多年,并且编著《南音指谱》全集4册(其中“指”36套、“谱”17套,1914年出版成册),对保存珍贵南音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林霁秋先生广征正史传奇,旁搜博采,考订唱词出处,编撰巨作《泉南指谱重编》(共分6册,“指”45套、“谱”13套,1921年由上海文瑞楼书庄出版),为南音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林先生再计划出版《南曲精选》20集,但因体弱多病,至1943年去世时只完成13集。林先生为南音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其历史功绩彪炳于南音史册。

集安堂在海外交流与传播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录制的很多南音产品都销往海外。1915年以后,又涌现一批南音名家,如纪经亩、叶文炉、吴深根、陈江渠、吴萍水等,使得该社深为南乐界所推崇。由于这批南音人的不懈努力与无私奉献,该社南音事业空前发展,引起海内外南音界关注。20世纪初该社应邀在鼓浪屿灌制南曲唱片,畅销东南亚并传播至西欧,成为国内南音走向海外传播世界的重要力量。1917年秋,应台北茶行公会会长陈朝骏礼聘,该社林祥玉、黄韞山、王增源、白坎臣、李启芳等人赴台演奏《百鸟归巢》等南音名谱。1928年,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慕名来厦邀请黄韞山、王增源、陈秀津、傅嗣东、许取章、白坎臣、欧阳泰、薛金枝、白丽华等名家录制南音“指”“谱”“曲”共17套,由于唱片畅销,增制8次仍供不应求。1931年,香港人士多利文邀请黄韞山、杨文赤、白厚、陈金钗、江来好、许彩凤等人赴港灌制唱片。随后,百代、胜利、兴登堡等唱片公司也竞相聘请纪经亩、吴萍水、洪金水、吴深根、薛金枝等在鼓浪屿灌制唱片30多盘,畅销海内外。

^① 采访者:陈孝余;采访对象:曾小咪;采访时间:2017年11月10日;采访地点:厦门集安堂乐社。主要参考该社内部书册《集安堂南乐社——成立110周年》(1993年3月)。

^② 据曾小咪女士介绍,因该乐社是安溪、同安两县的弦友发起,由南安、惠安、安海、晋江、永春等地弦友组成,故名“集安”。

从传承角度看,集安堂的历史贡献令人敬佩,尤其在跨境传承方面成绩斐然。如1940年吴萍水先生应聘到菲律宾为国风社、崇德社、宿务长和社等传授南音10多年。吴明辉将他遗留的近900首曲谱由编集成《南音锦曲选集》,又将许后章、吴萍水二人遗稿300余首、113个门头编出《南音锦曲续集》。还有纪经亩先生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南音交流与传播,被誉为“琵琶国手”“南乐泰斗”。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南音弦友流散,经费困难,原南田巷社址被日本占领,集安堂面临解散的危险。困难之下,纪经亩先生会同洪金练、厚顶先、苏春胜、洪晓春、王三连、丁乃杨等承担起负责馆社的重任。抗战胜利后,海内外弦友资助集安堂恢复活动,但原来的南田巷社址被政府占据。纪经亩等人四处奔走争取才保住该社两处产业,集安堂得以继续开展。

(二) 1949年10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古老南音艺术,集安堂得到了长足发展。据资料记载,1949—1966年间该社也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业都呈现新气象,馆社也迎来了生气勃勃的好局面。1950年河仔墘、南田巷两处产权正式办理登记,南音人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批爱好者加入该社,成员达到百余人。当时集安堂主要负责人是纪经亩先生,其他名师有王清华、陈江渠、吴深根、吴萍水、白灏、张孙典、李光弼、陈福例、陈美赞、林利、陈美各、吴在田、吴道长、陈盈金等一批南音先贤。新的时代,南音传承的道路变得更宽阔,南音人的干劲也是空前高涨。1951年纪经亩等人倡议组织“南乐研究社”;1952年庄树根、许茂源等人筹建“金风南乐茶座”,1955年更名为“金风南乐团”,1956年借用南田巷社址演出营业。这一时期该社南音传承活动活跃,教曲、和奏、清唱,各种南音形式纷纷展开,每逢民俗佳节,高搭锦棚,南音与民同乐,与民联欢。可见,该社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有了南音的学术研究和商业运作等思维。

集安堂积极参与南音传播。譬如,当时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始建播音,纪经亩先生带领该社数十名弦友,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到电台直播,并在

中央及地方电台播送南音曲目,坚持多年,为促进南音文化发展尤其是海峡两岸南音传播做出了贡献。另外,自1953年至1958年,该社南音名手陈福例、张孙典、吴道长、林利、陈美各、沈笑山、庄亚菲等参与厦门南音代表队先后到福州、上海、北京等地参加福建省和全国的演出与观摩,均受好评。如1957年集安堂南音社参加福建省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获得节目奖。1963年到上海演出,轰动一时,得到文艺界一致肯定。1954年应中国唱片公司之邀,该社录制南曲及器乐曲30多首。

20世纪50年代,该社致力于南音传承,如培养人才、整理曲目、创作新曲等。他们传承传统,对南音技法谨慎传承,譬如发扬箫弦法优点,对演唱时的呼吸、起声、发音、咬字、行腔、归韵等唱功精心研究。同时,纪经亩、吴道长等南乐前辈与陈福例、杨炳维等新人一道,创作出许多著名的新曲新谱。纪经亩、吴在田、吴深根等前期培养了一大批南音人才在当时就已闻名海内外,后期有一批南音人才成长起来,如张子贤、洪启生、白建东、郑雾娥、施惠珠、齐玲玲、方素芬、陈淑瑛、吴明玉、吴世安、曾小咪、庄艳莲、林俊萍、林加来、王秀怡等。纪经亩先生曾3次应聘到香港传授南音技艺,载誉而归。他与江来好等还先后到福建艺术学院讲授南音课程。

可以看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南音馆阁传承方式就已经非常多元化和多样化了,除了馆内传承,还有电台媒体传播、学校传承、演出交流、整理曲目等方式。这些馆阁南音传承方式与行为即使今天看来也着实令人钦佩!而这种传承方式的发展与演变,构成了南音馆阁传承方式的历史脉络,最终形成南音馆阁传承方式的话语体系和制度范式,亦即南音传承文化。

如果说此前是南音馆阁传承的“扬”期,那么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是其“抑”期。据记载,1966—1976年“文革”期间,该社财产被洗劫,两处社址被侵占,发展遇到了残酷的现实。不过,馆内弦友的南音热情和志趣并没有改变,仍冒着风险分别集在典宝路的陈再福家和吴厝巷的柯水源家等进行活动。此后一个阶段,该社成员又主动相邀定时在搬运公司老工人俱乐部和市工

人文化宫为群众演唱南音,场场爆满。在这个困难时期,南音人仍然坚持自己的南音信念,践行自己的南音梦想。譬如,张孙典、吴道长受聘到香港教授南音,纪经亩、吴道长等老先生坚持整理传统南曲和创作新曲。总之,南音人具有的南音传统越在困难时越彰显自身的“南音自觉”,中国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在他们身上显现得很突出。以纪经亩先生为代表的南音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南音做出自己的贡献。从今天来看,他们的确做出了令后人为之敬佩的历史贡献。

(三)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全新时期,时至今日,我们都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当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集安堂也是迎来了新发展时机,社址也得到了确定。据资料记载,1982 年 10 月河仔墘社址得以收回,又得到了李光弼、王为谦、李金狮等香港弦友的资助,乐社得到整修(1990 年和 1992 年两次翻修),现为乐社活动场所。1988 年该社两处社址办理产权“双登”。该社主持人,当时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纪经亩先生用余生为南音传承与乐社发展贡献力量,为拯救南音艺术四处奔走呼吁,在政府重视下厦门南乐社团得以合法活动。

自恢复活动以来,该社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加各种表演 180 多场。其中包括 1986 年元宵厦门南乐大会唱,1991 年特区 10 周年全市群众文艺调演等等。此外利用节假日深入街道、学校、企业、公共场所为群众演唱,接受报社、电台报道和专题采访。该社演出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1989 年国庆在工人文化宫演唱 3 天,座无虚席,为老百姓带来了久违了的南音音乐。同时,该乐社还经常与其他兄弟南音社进行各种形式的联谊和交流,如 1993 年该社一行 17 人先后抵达同安、安海、石狮、陈埭、泉州等地,通过交流增进乐社之间的友情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通过交往切磋技艺,共同发展。

社会参与方面,该社还参加社会比赛类活动,为推广南音和南音社会普及不遗余力,取得了很好成绩。1984 年至 1986 年参加厦门市调演比赛,1987 年参加福建省南音广播大赛,该社成绩均名列前茅。曾先后获奖 31 个,如 1987

年厦门鹭岛花朵文艺比赛,方安娜、洪妮娜荣获二等奖;1990 年湖里杯曲艺邀请赛,曾小咪荣获一等奖,洪亚玉(8 岁)获三等奖;1992 年禾山杯曲艺邀请赛,林俊萍获得二等奖,等等。另外,1991 年陈水吉、郭汉铭等 10 名老弦友获得市曲协颁发的荣誉证书。通过社会活动,不仅推广和普及了南音,也是对南音的传承。

在传承方面,该社除了参与社会活动、馆社交流与比赛活动外,还不断地继承、传承和发展南音艺术,收集整理传统南音曲谱,创编新曲目等。在德高望重的纪经亩先生对南音及集安堂无比热爱和敬业精神的感召下,该社很多成员积极从事传统南音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如沈笑山先生积极挖掘传统南音,他根据许友森、庄王菲等老艺人回忆口述,把失传的曲词和工尺谱进行详细记录,他还抄写很多南音曲谱提供海内外弦友采用。此外,一些成员参与南音创新工作,如洪北荣老师创作了《厦门岛》《颂雷锋》等一批新曲目,曾小咪与学校教师合作为少儿改编了南曲《直入花园》等。再则,该乐社成员也进行南音传播方面的工作,通过录制南音唱片等来传承传播南音文化,譬如 1987 年该社的周雪燕、齐玲玲等人录制的两盒南曲磁带由上海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等。

除此之外,集安堂还坚持“地推式”传承南音方式,即利用自身优势和各种社会途径走入社会、走进学校,手把手教授南音。对他们而言,南音是事业而不是业务,凡对南音事业有益的事,集安堂都积极投入、尽力而为。如林文宣、沈笑山、庄亚菲等老师应聘在福建省艺校厦门南曲班执教,从事南音专业教学,为南音艺术专业化和南音人才培养贡献力量;曾小咪女士到湖滨小学等中小学给孩子们传授南音,为南音未来培育新生力量。除了对外传承南音,该乐社还积极进行海峡两岸、海外的南音传承。譬如,该社陆续培养众多外地学员,如许友森、庄亚菲、沈笑山等乐社老师热情地给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地的南音求学者传授南音。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齐玲玲、沈笑山、曾小咪分别参加福建弦友组成的南音代表团和厦门南乐代表团,多次到菲律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此外,该社还接待海外南乐社团来

访并开展交流活动85批次等。更难能可贵的是,海内外南乐社团和弦友时刻都在关心集安堂的事业发展和前途,比如征得纪经亩先生同意,1986年举办建社百年大庆,并在集安堂举行纪经亩先生从艺75周年庆祝活动。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纪经亩老先生作为南音领域为数不多成就非凡的前辈,可谓南音“一代宗师”。他在集安堂南音乐社主持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为集安堂的建设与发展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其表现出来的南音精神值得钦佩,也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继承。除此之外,纪经亩先生在南音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功绩卓著,他选编了3本《南曲教材》等南音教材,自己独立或与同仁一起培养了许多南音方面的人才,其中现在的集安堂主要负责人曾小咪女士就是他发现和培养出来的优秀南音人才。

纪先生德高望重,性情谦和朴实,是南音界著名的演奏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可惜的是,纪经亩先生于1986年12月28日与世长辞,此乃集安堂乃至整个南音界重大损失。根据纪经亩先生前推荐,并经1984年3月、1987年6月、1990年3月3次成员大会选举,沈笑山、洪兆荣连任集安堂正副主任,苏春旺、陈水吉、陈金辉、金玉霖、郭汉铭、陈裕庆、庄亚菲、曾小咪、黄玉璇等人当选理事。此外,集安堂还聘请了一批海外知名人士作为名誉理事长和名誉主任等。集安堂通过这种内外结合、强强联合的方式来增加自身影响力和办社水平,同时也增强乐社对外交往和传承能力。这种举措虽然都是南音乐社通行之法,但集安堂做得更好,也的确促进了乐社发展,达到了办社效果。不论是在乐社本身的建设,还是在组织成员和社会活动规模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期。

近二三十年来,集安堂进入了后纪经亩时代,但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表现出了良好发展态势。据曾小咪女士介绍,近年来他们在继承乐社百年历史经验基础上继往开来,不断谋求新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生存能力和对外影响

力,继续在南音传承等方面做出自己的新的贡献。

三、承前启后:南音馆阁百年变迁的思考

以上梳理了集安堂南音社百年历程,借以窥见南音馆阁百年发展与传承的基本情况。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百年历程划分为1949年10月前的传统传承时期、1949年10月后的新传统传承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承时期。总体而言,南音馆阁百年变迁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特征。

(一) 南音称谓更替与南音馆阁传承

众所周知,南音有很多称谓,如弦管、南乐、南管、南曲、锦曲等,稍深入一点,我们又知道现在所谓的南音之前并不叫这个名称,而称“弦管”,同时上述这些称谓还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称谓。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弦管”到“南音”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南音研究专家郑国权先生指出:“泉州南音原称弦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泛称为南音的。”^[2]吕锤宽教授也指出:“目前学术界所习称的泉州南音或南管,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名称,一九八〇年代之前的台湾(地区)或一九四九年前的泉厦地区,局内人多称以弦管,如:‘敕桃弦管’,自称‘弦管人’,彼此互称为‘弦友’。《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经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披露后,该乐种的传统名称更获得历史文献的证据。因此,今日我们对该乐种的传统如仍要与历史传统有所联系,将它称为‘弦管’,似乎是较妥当的选择。”^[3]以上所言,郑国权先生指出了历史时间,吕锤宽教授证实了“弦管”之实,但都没有说明背后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泉州比台湾率先改名,笔者认为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意义有关,而吕锤宽老师“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解释部分回答了我的困惑^①”。

^① 笔者是通过微信和吕锤宽教授交流的,所引是吕老师的回答。交流时间:2019年2月23日下午3时。在此,特向吕老师对笔者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深表感谢!

那么,南音名称的更替对南音文化进而对南音馆阁产生了什么影响是需要思考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还不明显,或者说有说服力的内在直接关联还需要深入研究。不过,南音的更替从表演层面看,在百年中已经发生了几次变迁,如女性入馆这一传统禁忌被打破,再如女性南音表演的逐渐显现。从当代来看,目前南音馆阁中女性比重已经较之过去有了质的飞跃,甚至超越了男性。从这一角度而言,馆阁世纪变迁就是一部南音女性主义发展史。

此外,馆阁结构包括物理空间的改变也对南音表演以及传承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舞台的出现、现代电声设备的应用等。笔者认为,南音及其馆阁的历史变迁当中存在大量值得深挖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对南音传承方式乃至南音当代存在问题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然,这需要深入细微的考察,也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研究的地方。

(二) 馆阁名称变化与南音传承变迁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南音馆阁呈现出名称上的变更,即从馆阁到乐社再到协会的转变。譬如,泉州市晋江安海镇的“雅颂南音社”就是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社的名称叫“雅颂轩”,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南音馆阁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音馆阁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该馆的名称变成了“安海南音社”,“文革”后又更变为“安海雅颂南音社”。这种更名在泉州南音界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案,不管是出于行政管理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馆阁这一南音历史上的民间组织表现出了变化。

最近,南音界开始了新的发展,就是将之前统称的南音社改称为南音协会。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地方成立了南音协会,它们的属性也和南音社抑或传统馆阁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毕竟是南音馆阁的历史性变化,是南音馆阁百年变迁的一部分。总之,历史地看,南音馆阁经历了从馆阁到乐社再到协会的发展脉络,这种变迁表现出一种现实逻辑,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它自身的历史属性和社会功能。不过,从南音传承角度来看,馆阁“名”之变化带来了馆阁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的巨大改变,从当代来看,南音馆阁的社会功能在不断拓展,从人员到规模到作用都在不

断延伸。从这一角度看,南音馆阁的世纪变迁是以馆阁功能不断拓展的变迁史。作为以表演与传承为主要社会意义而存在的馆阁,其传承南音的形态与方式也在这一变迁中不断变迁与发展。

(三) 南音艺人与南音馆阁传承

历史考察显示,南音馆阁百年变迁与南音艺人(南音先生)个体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往往左右其发展,譬如对馆阁的建立和存在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南音的传承和发展与他们直接相关。据晋江陈埭今年82岁高龄的丁则友老先生介绍,陈埭过去没有南音馆阁,自己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习南音的,师从黄首万、张在我等南音名家。这与丁世彬先生所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吾父丁金裕,吾师黄首万、任清水、张在我亲手传授,三位先师于六七十年代在陈埭设馆授徒,时间达十几年,故当时陈埭弦管人高峰期近两百人,且学箫弦者数十人,虽功夫有高低之分,但都均精于此道,这也是弦管界对箫弦法的基本共识”^{[4]57},情况十分吻合。

历史地看,泉州南音“传至明清、民国,至中华,民间学习弦管,一般都是由几个爱好者发起,出资聘请社会上有名气的弦管先生任教。旧时,聘任弦管先生的规矩,最短的时间为4个月(一馆)就被辞退,那么这个弦管先生在弦管界是很难立足的,也是很没有面子的。笔者的几个老师来陈埭任教,如黄首万老师、任清水老师、张在我老师、蔡森木老师,时间最短都在3年以上,且是在1966年碰到‘文革’压制,这几位先贤被迫离开陈埭,至1968年,这几位老师才陆续地又到陈埭执教。可以这样说,陈埭几个自然村,比笔者接触弦管后,约两年多的时间(扣除‘文革’初期),每个村都有弦管先生在馆任教,共有9个南音馆阁,学弦管的人约三到四百人。直至1979年,一些老前辈去世,一些到港澳或外地谋生,甚至有部分人受‘文革’冲击,退出南音界,至此,陈埭的村落馆阁,有的已不到人(则所谓的‘不成馆’)。因此,笔者与几位同好商议,弃馆成社,经同意,于1979年成立陈埭民族南音社,社址设于陈埭街礼拜堂,丁顺德老先生任社长,笔者任副社长,社员70多人。社址几经迁徙,至1992年,社员

集资,海外侨胞即社员先达支持,始自建社址于陈埭丁氏祠堂左侧,面积约150平方米,共二层,楼下演奏台,楼上练习室。此后,陈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南音人才,乐器方面在南音界就有很大的影响力”^{[4]118}。

综上所述,厦门集安堂南音社作为福建南音界标志性馆阁的百年变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曲折发展的“前世”,其“今生”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保持着传承历史和开创未来的样态。集安堂作为南音馆阁百年历史中的代表在推动南音文化发展,特别是在南音传播(国内、海外)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质言之,历史研究的主旨是探寻历史发展特征和规律,从这一意义出发,南音传统馆阁在历史进程中呈现3个特点:(1)传统馆阁都经历了艰难岁月。(2)南音馆阁人在所处历史当下勇于实践,并且都有一种强烈的“担当”与“自觉”,即一种历史的担当和文化遗产的自觉。(3)在这种传承中个人起到主导作用,其中兼有发起和担当的双重内涵。通过考察笔者发现,福建南音之所以能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正是因为当地当下存在着很多像“集安堂”一样的百年老馆。这些老馆阁就像家族中的“长者”,维系着南音家族文化的传统,

保持着传统南音的特征,昭示着南音文化的价值,汇集着南音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南音先生的精神,联结着新老南音人的代际关系。因此,可以说,今天的南音传承与发展得益于馆阁的作用,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馆阁。

历史影响当下,当下接续历史。南音馆阁的百年变迁是一场宏观演进史,集安堂这一个案恰好揭示和证明了这一演进过程。其中发生了太多值得思考和探究的东西,如南音人的变迁、表演形态的变化以及传承方式的发展等。新南音方式和南音新方式是当代南音的新文化表达,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这一领域目前学界还未给予更多关注,需要我们进入其中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 [1] 马越. 集安堂:一个南音曲馆的人类学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2014.
- [2] 苏统谋,丁水清,编校. 弦管指谱大全:上册[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1.
- [3] 吴抱负,藏本,郑国权,编注.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5.
- [4] 丁世彬. 闽南弦管概论[M]. 新加坡:中国(新加坡)上海书局,2009.

The Changes of Nanyin Pavilions over the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Xiamen Ji An Tang

CHEN Xiao-yu¹, WANG Qiong²

(1. School of Music,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China;

2. School of Media and Art Design,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oldest existing music styles in China, Nanyin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music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pavilion as a typical field of Nanyin culture is an object of concer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Nanyin pavilions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in depth.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n Nanyin inheritance by studying Xiamen Ji An Tang in terms of its changes over the century in three periods—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Key words: Nanyin; pavilion; Ji An Tang

(责任编辑 冯庆福)